



新民时论

疑罪从无是防范冤案的根本

宋鹏伟

最高法近日发布《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。《意见》提出,为防范冤假错案,要做到有罪则判,无罪放人,对于证据不足,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,按照疑罪从无原则,依法作出无罪判决,严格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要求。

余祥林、赵作海、张氏叔侄、念斌、呼格吉勒图、聂树斌……沉冤得以昭雪时,有人终于重见天日,获得了国家赔偿,而有人却早已因此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。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?那只是在和最糟的结

果作对比,对于蒙冤的当事人来说,一旦冤案发生,无论结局如何,悲剧都已酿就。

尽可能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,靠的是司法体系的良性运转——能够在不断纠错与制衡中避免一错到底。是否能做到疑罪从无,决定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倾向性,也决定着被告人的命运。哪些证据可以采信,证人是否必须出庭,如果本着疑罪从无的理念审判,必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,在最大限度保证当事人权益的同时,也会促使真相尽早浮出水面。相反,则制衡作用失

效,极易酿成冤假错案。

疑罪从无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,更是审判时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。体现在审判中,就是一个个严苛的细节: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;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,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,应当作出证据不足、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,定罪证据确实、充分,量刑证据存疑的,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;实现办案模式从“由供到证”向“由证到供”的根本转变……

排除那些无法证明收集方式合法的证据,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确保程序正义,也让屈打成招丧失了生存土壤。

“疑”的成本看似很低,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。数据也显示,中国自诉案件的无罪率较高,而公诉案件的无罪率却畸低。其实这也不难理解:在既不能完全排除被告人犯罪可能性,又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,将嫌疑人无罪释放确实并非易事。一方面,要面对被害方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,另一方面,退回补充侦查和“无罪释放”往往又被视作对公安机关

和检察机关工作的否定,更可能引发赔偿、质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。然而,相比于不放过一个无法证明有罪的“坏人”,确保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显然更加重要:如果无法实现“以审判为中心”,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就成为一句空话,更何谈让每个人坚信法律可以还自己以清白?

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,离不开系统性的司法体制改革。首先,需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。设想一下,如果有罪判决率等是加分指标,关系着法官的收入与升迁,那么有罪判决岂不很有“效率”?相反,

如果考评体系设定让绩效考核同审判原则方向一致,自然会鼓励法官更积极地去发现疑点。其次,错案追究机制应当更加完善。不仅要追究故意违法和具有重大过失的责任人进行严惩,也要对一般过失的免责边界予以明晰。

完全杜绝错案也许很难做到,但从体制机制上不为冤案的发生创造条件,却是可以也必须做到的。作为防范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“防线”,法院在审判时唯有真正贯彻落实疑罪从无,才能避免悲剧的二次发生,并让法治真正成为每个人的信仰。

群嘲杨振宁,小心寒了人才环境

李泓冰



余烬录

网上流传中学生嘲家长的段子:问:为什么家长只看分数?答:废话,你以为他们看得懂题目?

不妨移植到杨振宁回归母事。为什么大家只看杨振宁的婚恋八卦?嘿,你以为大家看得懂他的宇称不守恒原理和杨-米尔斯理论?一个年逾九旬的理论物理学家,行了不少助学善事,大幅推进祖国相关领域研究向世界前沿靠近,垂暮之年选择回归——他做错了什么,竟招来同胞大面积嘲讽?鲜有人关注其学术建树以及回归后将如何推动基础学科建设,几乎所有眼球都浪掷在其私域,把一桩科学家美事变成了娱乐版头条。如此舆论环境,谁还敢回?

说到环境,还真生出几分杞忧。

吃瓜群众嘴碎也罢了,如果中国人才环境也充满风刀霜剑,兹事体大。

常有人把杨振宁和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相提并论,以后者的壮烈来贬损前者的“猥琐”。然而,杨是做更“虚化”学术的理论物理学家,又是国民党高官的女婿,如果早年便归国,能逃得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折腾吗?能执得理论物理研究牛耳吗?苟全性命于乱世,就得额手称庆了。

时代天翻地覆,科学家终于迎来好日子。

值得认真检视的是,当下的科研环境,是否能年轻的“杨振宁”们安心科研,直至脱颖而出,让世界刮目相看?

东西南北,大城小镇,各级政府都忙着建科技中心、筑人才高地,招才引智妙招迭出,使尽浑身解数,拿出房子票子还有北上广的户口挖角,延揽院士或有

杰出成就的科学家。可营造催生人才、吸引人才的环境,并不只喂胡萝卜那么简单,眼睛更不能只盯着功名就的“杨振宁”。

人民日报有篇报道,说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生活窘迫,“每个月只能算过着日子,一度怀疑十年寒窗苦读有什么意义”“一旦哪年没争取到课题,就只能拿一两千的基本工资”,只能举债度日甚至被迫离职……学术环境也过于严苛,比如只认效益不认人,不能瞬间变现的科研易遭冷遇,一些院所用管官的办法来管科学家、管科研经费,甚至影响乃至正常的学术交流……

科学探索充满艰辛,需要专注更需要尊重。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宽松环境,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。基础研究领域更是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,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战略要地。然而,“创新”虽成热词,创新的主角——科研人才,却是被漠视的模糊背影,非得等到诺贝尔奖之类的承认,才奉若神明。

中国有丰富的资源,有能力为世界学者创造世界级工作环境。拥有获诺贝尔奖的学者不再是难事,难就难在让年轻的学者有优渥的土壤,以在中国获得的研究成果去争取今后的诺贝尔奖。而且,中国的发展,亟需实现动力转换,在顶层设计中心,倚仗科技创新,乃至万众创新,是动力转换的要义。但创新这事,核心就是集聚人才。科研人员得不到善待,得不到机遇的“苦”,是一种社会示范效应,不但伤害科学研究本身,也会挫伤社会创新氛围。

骂了杨振宁,会寒了人才的舆论环境;苦了基础科研工作,就会让聪明孩子都趋之若鹜往钱快的行当里钻……

运去金成铁 时来铁似金

任大刚



贤文解毒

万物均有盛衰。有些事物的生长,挡也挡不住;而有些事物的衰败,谁也无奈何。《增广贤文》里,“运去金成铁,时来铁似金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这种不容易讲清楚的现象,在古代被命名为时运,干某件事情失败,往往归之于“时运不济”,俗称命不好。

譬如近十年来,前后有过两轮股市暴涨暴跌。记得第一轮暴涨时,几乎是全体股民喜气洋洋,马路上,商场里,餐馆就餐,十步之内,必有人谈股票。只要有股,无一不涨,连一些垃圾股都有数倍的涨幅。这就是“时来铁似金”。

但一进入股市下行通道,再绩优的股票都扛不住,非但人群聚集的地方人蔫儿了,个别心理脆弱的,轻则闹出神经病,重的了却一生。这就是“运去金成铁”。

这种场景,几年后几乎原封不动重演了一次,可见有内在机理在发挥作用。

这个内在机理是什么?有各种见仁见智的分析,既然能够分析,就说明它是可知的,并不是像古人所说的神秘莫测的“大势”。

不过在“时运”“大势”里,微末的个体,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,比如你是个散户,股票要跌,你还能阻挡得了?今天你在高位卖出,明天暴跌了感叹“时来铁似金”,恰如其分;反之,你刚低价卖出,随后就是一路狂涨,于是你哀叹“运去金成铁”,也恰如其分,也能获得某些心理按摩。

不过如果你是大户,资金足以左右某只股票的涨跌,那么你大概不会经常想到“运去金成铁,时来铁似金”这两句话;你如果是更大的大户,资金量足以左右一批股票的涨跌,那么你真

不大会想到这两句话了。

所以,同样是这两句话,在不同的人身上,有不同的贴切性。总的特点是,左右局势(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界)能力越弱,越是靠运气,越相信这句话;反之,越不相信。

不过人左右局势的能力,强弱是相对的。崇祯皇帝权势最大,据说也异常勤政,但面对明朝末年的局势,他也无可奈何。到那个时候,明王朝不在他的手上倒掉,多半也会在他的子孙手上倒掉。

所以“运去金成铁,时来铁似金”这两句话,实际有两种功效。

一种是自己的确无法左右局面,真切反映了自己的卑微、渺小,包括崇祯皇帝这样的人,也包括普通人。人的各种技能在不断提高,但总有人能力无法达到的地方,只能留给命运、偶然因素等等,只能听任“运去金成铁,时来铁似金”。

一种是可以掌握的命运,但由于自己的懒惰、疏忽、愚蠢等等,而导致失败,这时说“运去金成铁,时来铁似金”,实际是一种推脱和掩饰,有时候是自我开解,自我的心理疏导。在这层意义上,“运去金成铁,时来铁似金”就是一碗典型的心灵鸡汤。

心灵鸡汤就是这样,它总是试图用一小部分,甚至个别人才可以从容应对的事情,不问时空环境,暗示“你也可以”,或者你不是不可以,而只是运气欠佳。加油哦。

但是它恰恰忘了,每个个体的际遇都是不一样的,顶多有一些大数上的相似性而已,别人行,不表示你也行;同理,别人不行,不表示你也不行。

在大呼隆式的“大势”“命运”中不经意间淹没个性和个体的努力,是类似格言警句的通病,它以貌似真理性的样子出现,但往往充满市侩一样的妥协。

“空巢青年”与“穷忙族”

魏英杰



书山寻路

近来,“空巢青年”一词引起关注与热议。据央视等媒体报道,“他们是主动选择独居的年轻人,他们远离家乡,在大城市中打拼,还大都有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,他们大多20岁至39岁,他们的同类人竟有2000万人”。

在媒体描述中,独居似乎成了“空巢青年”的主要特征,由此衍生的又主要是孤独、无聊等心理或精神层面的问题。所以也有人认为,“空巢青年”更准确的称呼是“独居青年”。

但这么说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。“空巢青年”现象的背后,远不止“空巢”那么简单。试问,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主动选择独居,还是被迫无奈而独居?这种生活状态,又是否与其收入有关?报道指出,这群人“收入尚可”,却也不能不提,他们“更多的是在出租房上网”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项调查更明确地显示出,他们面临的两大困境分别为缺乏感情寄托(57.9%)和居住条件差(57.8%)。

缺乏情感寄托也好,居住条件差也罢,都指向一个问题,即他们处于社会的“夹心层”,无论年龄特征还是经济收入都是不上不下,不尴不尬,缺乏更好的上升渠道。实际上,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因为现实条件所限,才不得不选择“空巢”。报道也披露,21%的“空巢青年”有“月光”现象或轻度负债。

这和《穷忙》一书所谈到的“穷忙族”有不少相似之处。这本书描写的是美国那些处于贫困线以及徘徊在贫困线边缘的人群,“他们苦苦挣扎,筋疲力尽,找不到出路。他们的工资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,让他们脱离贫困,相反,他们为生活所累”。“无论年景是好是

坏,他们都过得很苦。”“在他们尝试逃离困境的过程中,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们不得不跨越的障碍。”

从收入角度讲,“空巢青年”并非绝对对贫困人群,毕竟他们还能单独租住或与他人合租,但从人生的基本需求来讲,他们确实不仅穷,而且真的是“穷忙”。他们中的许多人,每个月收入只够勉强维持正常开支,要想在城市里安家落户、扎根下来,却仍遥不可及。这里所说的安家落户,还不是把户口迁到城里,在城区买房,而是在城里结婚生子,让孩子像城里人那样生活、读书、成长。这意味着,在改善自身境遇之前,他们只能无休止地陷入既穷且忙的循环。

在媒体报道中,“空巢青年”可说是低收入白领的代名词。但这又等于把收入低的一些职业人群排除在外。比如数量庞大的快递小哥、外卖小哥,他们居无定所,收入不稳定,多数只能群租或住在集体宿舍,连“空巢”机会都没有。这一部分人群,明显也是“穷忙族”的一员。

“穷忙”作为一种职业状态,或者难以避免。特别是,对于刚踏入社会、既无父辈荫庇又无事业基础的青年,有过这样的经历未必是坏事,例如,刚在深交所上市的顺丰控股的创始人王卫,因为家里穷高中就辍学了,后来靠送快递起家,一路走到今天成为千亿富豪。关键是要看,在这个社会,依靠个人奋斗实现梦想的概率有多大。像王卫这样的例子固然罕见,但如果一个人“穷忙”而一无所获,这不光是个人能力大小的问题了。

梦想是成功的入场券。一旦“空巢青年”沦为“穷忙族”,看不到未来的出路,他们将失去对梦想的信念,甚至厌倦“梦想”这个词本身,所以,让年轻人保持梦想,是一个课题。